

评《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郭 齐 勇

何显明、雍涛合著的《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一书,去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十章,近40万字。内容包括毛泽东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毛泽东哲学的文化性格,毛泽东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政治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以及毛泽东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构、中国文化的前景等问题。

该书从文化的视野,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广阔背景中去透视毛泽东哲学的思想特质、文化渊源,从总体上研究毛泽东及其哲学的文化性格、价值观念、思想模式、心理结构,把握毛泽东哲学中的历史沉淀和创新意义,讨论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系。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方面,该书代表了国内80年代中期以来的视角转换与方法更新,透出清新的活力。该书作者不满足于时下的类比研究,不愿意拘泥于零碎地、局部地说明毛泽东对传统哲学典籍、范畴、成语的改造,而是希冀高屋建瓴式地把握毛泽东哲学的神韵及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内在联系。不用说,这是一个具有高难度的课题。

毛泽东文化思想究意如何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流衍中加以定位,他对民族精英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贡献与局限究竟如何加以辨析,自是值得深究又难于深究的问题。海内外毛泽东研究中,或视之为传统主义者,界定为乌托邦理想主义或民粹主义;或视之为整体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者,界定为民族虚无主义。作者据实批评了上述武断的结论,将毛泽东哲学还原到它所诞生、成长、发展的文化背景或氛围中,详细地研究了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五四时期”若干大的思潮的区别和联系,以及毛泽东哲学如何在与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主张“儒学复兴”的文化保守主义、国民党官方哲学和党内主张“全盘苏化”的教条主义,既斗争又融合、既排拒又吸取的前提下,重新选择与阐释、继承与批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的。作为本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巨擘,毛泽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卓越而伟大的贡献。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

第一,揭示了毛泽东哲学的文化性格。作者指出:“不能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承继,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立起来。毛泽东哲学的中国文化性格和中国文化精神根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形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生根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西方哲学形态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智慧,从而进一步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信仰,则又使他得以借助这一崭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文化进行

深刻的思想变革,使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不再呈现为对民族传统的消极认同,而是呈现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升华。”(该书第100—101页)作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哲学的,具有双重的文化性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渗透、融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身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不断互动着的两个方面。由此而奠定了毛泽东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尤其可贵的是,本书着力研究了毛泽东哲学的个性特征。毛泽东哲学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不仅仅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又是通晓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在活用文化资源上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而又不乏独特偏好与取向的毛泽东个人的天才创造。本书关于毛泽东及其哲学所透显的“尚变”、“主动”、“尊斗”、“率性”、“平民意识”、“奴隶史观”、反权威的“造反意志”、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道德的理想主义、经世致用、笃行履践、嘲弄徒事读书、相对贬损知识等等特点的抉发,令人拍案叫绝!作者并没有对这些特点作简单的好坏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而是平实地说明毛泽东哲学的这些特质与某种传统资源,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激进爱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与他个人的学养、经历、师友的启迪、外缘的刺激的关系,以及他70年心路历程的嬗变,和对当时或今后中国文化的多方面影响。这样,就把毛泽东的生命与毛泽东的哲学融成一体,把毛泽东的时代与毛泽东个人的气质融成一体,给了我们一个栩栩如生、多维度的毛泽东及其哲学的整体形象。如此观照毛泽东哲学,避免了主观片面地肢解或是非的肤论赘说。

第二,梳理了毛泽东对传统哲学的继承与批导。除前两章论述毛泽东哲学诞生的文化背景、毛泽东哲学的文化性格,末两章论述毛泽东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构关系之外,该书中间六章非常细腻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哲学具有深刻的继承关系的六大方面:“实践理性与实事求是之学”、“现代知行合一论”、“内圣外王与主观世界的重构”、“中西合璧的矛盾辩证法”、“中国式的历史感”、“现代民本主义政治哲学”。

作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一个极有特色的思想贡献,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化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乃至人生态度、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对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直接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运用前景。这得益于中国哲学实事求是的传统。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道路,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实际问题,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文化背景则是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哲学反对本体与现象两重世界二分的“外在超越”理路,主张即体即用、天道人道不二、即高明而道中庸、即本体即方法的“内在超越”理路,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土壤。

作者特别重视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模式、“经世致用”学风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作者的深刻慧解是:包括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内的一代巨匠,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批判儒学负面影响,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他们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与行为方式却仍然是儒家的!这并不是一个思想悖论,而是表层与深层的区分。毋宁说,他们正是以深深地内化、积淀于主体心理结构深处的儒家精神价值系统、思维与行为方式来洗涤儒学在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外在的窒压人民的负面化、形式化的躯壳。所以,从表层来看,毛泽东反儒(当然他对儒家思想命题和著名代表人物亦有公正持平的评价);从深层来看,毛泽东仍然受到儒学精神的制约。这种分析是深刻而独到的!毛泽东高度注重主体自我的“内圣”实践工夫,强调“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改造社会并改造自身,尤其是注重主体知(认知结构)、情(情感结

构)、意(意志结构)的重建和深深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不管其所造成的现实或历史后果的多面性如何,平心而论,确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背景。这是不能简单化地说东道西的!

毛泽东呼唤启蒙,呼唤民主,对传统文化中的礼教秩序、宗法制度、封闭性社会结构及其对人性的压抑作了尖锐的批判,分析了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儒家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大同”理想境界、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实用理性、知行统合观念都曾内化为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模型,至于法家的法、术、势的治术,墨家的小生产者价值观及摩顶放踵的斗争意志,道家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和诗化哲学的气质,老子与兵家的辩证法等等,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都与毛泽东有着相当微妙的精神联系。他在区分人民大众的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时,又倾向于非主流文化而反对主流文化,因而往往非难孔孟正统儒家、赞赏墨家和儒学异端。他的语言结构和思想层次是多重的、复杂的,不应当作表层单面的理解。

第三,从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联上分析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作者指出,晚年毛泽东广泛使用的哲学概念,往往与传统哲学内涵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的理解、运用,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性的错位,即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思想层次上来理解运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第87页)例如,毛泽东夸大“心力”,过于颂扬主观战斗精神和人的能动性,致使“心学”的流弊一度泛滥成灾。又如,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晚年毛泽东“先知归行”的思想倾向,除了与他在总结教条主义错误的思维教训时发生的片面性有关外,亦不能不看到墨子、颜习斋等狭隘经验论对他的影响。“文革”期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七八年来一次”以及他提倡的“奴隶史观”,都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循环论和平民意识的烙印。这种分析应该说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作者最后指出,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我们要以开放、理性、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及其文化遗产。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总之,在梳理毛泽东与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联系上,该书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水平推进到了该学科目前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一部研究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力作。本书的不足是阐述毛泽东与古代传统思想的关系上,侧重于青年毛泽东与老年毛泽东,在某些章节中造成了中年毛泽东的旁落。此外,对于传统的某些思想侧面与作者所要论述的毛泽东文化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有脱节之感。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改进的。

(责任编辑 彭昌林)